

乡村振兴 十人谈

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解读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十位资深专家多维度深度解读

乡村振兴的战略、战术问题，

开讲『乡村振兴战略十堂课』

主编◎温铁军 张孝德

江西教育出版社

WWW.JXEDUCATION.PUB.CN

乡村振兴 十人谈

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解读

主编◎温铁军 张孝德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乡村振兴十人谈: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解读

温铁军 张孝德 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705-0413-8

定价: 36.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TOUGAO_BOOK@126.com 来稿电话:0791-86706210

网址:<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18-48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乡村振兴

留得住的乡味

记得住的乡愁



序

乡村发展是党中央一直持续关注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再度把乡村问题提到了少有的历史与时代高度。在中国迈向新时代的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可以发现，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战略，是基于新思维、新理念、新思路的重大战略。如果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新的思维认识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就会犯方向性错误。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我们有强大的物力、财力和执行力，但也形成了阻碍我们正确认识乡村、读懂中国乡村的诸多惯性思维。所以，在这个重大转型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知”比“行”更重要。

乡村是中华文明基因的携带者，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一直是走一条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果从纯经济功能看乡村，中国乡村地位和作用，可以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如果按照目前盛行的物质主义、GDP主义的认识来解决乡村问题，让乡村快速城市化，让农民快速市民化，那么以这样的思维就无法深度理解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

乡村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两极，它们是等值的，具有相互无法替

代的各自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在中国尤为如此。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是十九大报告关于城乡关系的新提法、新思维、新定位。但长期以来，我们一谈到乡村，很多人就下意识地认为乡村是愚昧的、落后的，乡村是不文明的，城市才是文明的。如果以这种思维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会无视中华五千年乡村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就会把“乡村建设得与城市一样”作为乡村建设的目标。在十九大之后，这种认知思维仍然在流行。

乡村作为农业生产的载体，是以生命为对象，以自然、乡土文化为资本，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为目标的农业生产，它是不同于工业的一种独特生产方式。但在如何发展乡村经济上，我们却一直被另一种思维左右，即以工业经济的思维来发展我们的乡村经济。按照这种思维，小农经济被认为是中国迈向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对于这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国小农经济正了名，明确提出小农户能够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尽管如此，但以小而美、小而优、小而多样化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若想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目前仍有很大障碍。

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是生人社会，由此决定了不能把治理城市的思路搬到乡村来。鉴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乡村的治理体系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城市治理思维在治理乡村。

对于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灵的问题，研究的文章很多，但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假定，就是认为这种民主选举制度没有问题，问题的症结主要是农民素质不高、法治不健全等。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思维，不能回到以熟人社会为逻辑起点来探索乡村治理，可以肯定，对于我们国家乡村治理难题的破解，就会越破解问题越多。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村有乾坤，事关天下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变成了乡村。从“农村”到“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其中却包含着中央对乡村振兴的新思维。随着称谓的改变，

今年三月召开的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还把原来的农业部变成了农村农业部。

现在的农村称谓，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理论。按照三次产业理论，农村的功能是专门从事第一产业的地方。而承载着中国文化与文明基因的乡村，是一个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于一身的文明体。从农村到乡村，预示着中央管理乡村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乡村功能认识的转变。按照这个思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而非农村振兴战略。如何摒弃以往的碎片化思维、纯经济思维，以一种系统整合的思维解决乡村文明发展的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思路与理念。

乡村振兴如此重要，谁来振兴乡村？对于这个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最有新意的要求：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源于血缘关系及熟人社会的乡村，是一个以亲情关系为维系纽带的乡村。可以说，这种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敦厚、本分、好客、重情的亲情特质，已成为农民特有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要更好地认识农村，与农民兄弟打交道交朋友，也必须要以同样的思维来进行。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总要求，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开启乡村振兴的第一道门，就是对中国乡村、农民的感恩思维。这是将党的政策与乡村联系起来的重要通道，这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新时代的重要战略。虽说践行很难，但将其认识清楚同样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认识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深度解读乡村振兴战略，就显得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将长期在第一线关注、研究甚至践行乡村建设的十位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了一次汇集，希望能为乡村振兴参与者、践行者、研究者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2018年6月1日

目
录**十人谈◎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全球危机与中国战略转型中的乡村建设·····	003
一、两次输入型危机及其不同应对	004
二、金融资本阶段全球化竞争的实质	007
三、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战略转型的出路	011
四、国家的大战略与乡村建设的大逻辑	018

十人谈◎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乡村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027
一、乡村是中华文明之根，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之基	027
二、城市与乡村价值平等，没有高下之分	030
三、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走在另类现代化道路上	036
四、新时代，再度倒逼中国走自己的文明之路	040
五、乡村逢生态文明兴，迈向新时代从乡村文明开始	044

十人谈◎贺雪峰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053
一、乐与忧：中国乡村发展的最好时代	054
二、乡村是农民的保障，是最后的退路	058
三、乡村振兴，须直面乡村的核心问题	061
四、乡村文化快速变迁，农民认知陷入迷乱	066
五、重塑乡村文化，先治标后治本	069

十人谈◎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先明确这两个问题·····	075
一、发展什么样的农业	076
二、建设什么样的乡村	084

十人谈◎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乡村振兴之道：核心机制、产业兴旺与共治共益·····	097
一、问题与机制：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	097
二、新时代：过剩经济与城乡中国	100
三、面对新需求：发现乡村新价值	103
四、创造新供给：一二三产业融合	105
五、培育新业态：日韩经验与六次产业	108
六、做出新探索：“共治共益”体系	111

十人谈◎徐祥临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框架：双层经营 + 三位一体	119
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一般方法论	120
二、农民和土地关系的最佳选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123
三、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131
四、展望：习近平总书记开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纪元	139

十人谈◎何慧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

弘农试验：“文化本位”的乡村复兴	143
一、什么是“文化本位”的乡村复兴	144
二、弘农试验：从村庄共同体文化的培养出发	148
三、以“文”化人：弘农书院的由来与力量源泉	153
四、《弘农儿女》的诞生	157
五、文化本位：一种传承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159

十人谈◎杨 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构建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重建乡村的社会基础	165
一、中国乡村的发展与农户的分化	166
二、小农户走向现代化的两条路径探索	168
三、希望在综合农协	171
四、中国小农户如何做综合农协	176
五、综合农协落地的探索	179
六、“农禾之家”以“百乡工程”推动乡村振兴的探索	184

十人谈◎廖晓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用中医思维治理乡村·····	189
一、中医思维的三重启示	190
二、乐和理念：找到一个源头	194
三、乐和社工：引进一支队伍	195
四、乐和治理：夯实一个基础	197
五、乐和礼义：孕育一种民风	200
六、乐和生计：营造一种生活	203
七、乐和人居：描绘一道风景	205
八、乐和养生：守望一份乡情	207
九、用中医思维营造乡村共同体	209

十人谈◎胡跃高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

论中国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的基本战略问题·····	213
一、处于全球农业危机漩涡中的中国农业	216
二、生态文明：世界农业危机中的转机	218
三、走全域有机农业发展道路	221
四、落实全域有机农业的战略布局	224
五、若干战略方针	227

十人谈◎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作者简介

温铁军，“三农”政策专家，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先后承担了多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I类）、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等项目。代表著作：《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摘要】

现在的全球危机，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美国向世界转嫁成本。只要把握金融资本和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复杂矛盾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中国经济正在“脱实向虚”；而乡村振兴依然是投资主导型的国家战略——把过剩生产能力导向乡村基本建设和社会建设——也是改正虚拟化的战略。而在中国乡村振兴中，如果真能贯彻城乡融合，实现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的相辅相成，未尝不是体现中国特色的重大战略调整。特别是当我们遭遇到巨大外部压力时，如果没有乡土社会的复兴，国家抵御外部转嫁危机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

全球危机与中国战略转型中的乡村建设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中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缺乏深度。因为从西方照搬来的所谓的理论解释，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也就是说，海内外关于中国的很多说法，仍然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意识形态。

实际上，我们现在照搬西方的所谓的社会科学体系，或者人文知识体系，一定程度上还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性包装。也许，因为是包装，就无法解释转型时期的复杂矛盾，社会的情绪化争论频发，在热点问题上的派系色彩就比较重。

我们面临的真实情况，恰是中共十九大归纳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表现：一方面自然资源环境条件非常有限，另一方面难以在沿海经济带更多承担全球危机压力的条件下，要改变当年做出的本来就是推进不平

衡发展的决策——强调东部沿海先发展，一部分人先富，再搞所谓先富带后富。

但是，更为深刻的问题是，仅就五大气候带覆盖下的中国三级台阶的地理分布客观条件约束来看，当年那个先富带后富的说法是很难实现的。当然，相对于中国这种区域差别复杂的国家而言，此说法当年被大家接受，并且作为一种正确的战略选择，也无可厚非。

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客观上看主要是城乡、区域、贫富这三大差别严重拉大。其中，城市与农村地区的不平衡、乡土文化的不充分，尤为突出。

这些不平衡的矛盾及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主观客观都有的，是中国客观上三级台阶的地理分布、五大气候带约束条件下形成的，是浅表地理资源多样化的后果。

一、两次输入型危机及其不同应对

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加入全球化的好处，但忽略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都是有代价的。诚然，没有任何事情是只有收益没有成本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快全球化进程以来，我们的危机基本上都是“输入型危机”，当然也有相应的内部因素。比如，1989~1993年美国制裁要求外资全面撤离之际，我们推进这种严重不平衡的改革，就直接导致了内需的大幅度下降。

接着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4500万国企打工者不叫失业叫下岗待业的事情——在统计资料当中他们是没有失业的工人，而实际上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失业。4500万国企职工的下岗对应着上世纪90年代的人均赡养系数曾达3.3，那时超过1亿人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还会有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吗？当然没有。同期，在一系列的宏观改革成本向农村转嫁之下出现的是，乡村基层人不敷出造成农民的负担大幅度提高。别说只有旧社会预

征税，在 90 年代某些地方的预征税已经到了 2007 年。那时农村税费人均负担和亩均负担都是历史最高的，因此农村也没有条件扩大内需。

由此可知，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外需，那就得加快全球化。这是主观客观两大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尽管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但那时海外投资者找我咨询，我都告诉他们，中国并不是 13 亿人口的大市场，只是城市有部分支付能力的有限市场。这就像我今天告诉国内去印度投资的企业一样，不要看印度是一个 12 亿人口的大市场，印度 92% 人口不在你们想象的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中，而在体制之外的“灰色地带”。

因为没有内需，到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进出口占 GDP 的比重高达 70% 左右，是世界最高的。就在这种情况下，遭遇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突然出现外需下降，中国就陡然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那几乎是西方 1929 ~ 1933 年大危机的翻版，最大不同，在于西方因危机而演化为二次大战。

中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难道中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吗？不。决策层很清楚，并且及时转向“投资拉动”。

诚然，我们只不过是没有在正规文件的表达中清晰表述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遭遇的第一次生产过剩大危机；也没有说明西方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生产过剩危机条件下，哪些市场化国家走向了战争，实际上互相摧毁对方生产能力，直到把美国拉入战争才演化为世界大战。因为这个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化，正是今天大家所相信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应对生产过剩危机，实施的是“中国版”的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朱镕基的“铁腕新政”。1998 年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3.6 万亿投资，其中三分之二国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政府债务数量及占比都大幅度上升。但是，我认为这是“建设性负债”。因为西部开发没有回报，那时西部修高速公路，路上没几辆车，没多少人交过路费，所以投资是不可能回收的，于是就变成

了债务，我称其为“沉没成本”。此外就是东北振兴，2万亿多投资，也大部分属于“沉没成本”。

从东亚金融风暴到2003年政府换届，基本建设投资合计约6万亿，由此导致中国进入到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时代，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下一届政府接手，就跟“萧规曹随”的道理是一样的，继续扩大投资拉动经济。新政府第一个战略是中部崛起，大约3万亿的投资；第二个战略是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到2017年已经累计投资13万亿，可见，这20年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GDP增长。

中国特色的投资拉动依赖举国体制。虽然稳住了中国GDP的“七上八下”，也一定会有大量的“沉没成本”。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形成的豪华机场、高铁、高速路、车站码头，以及政府大楼、场馆等国有物业资产。所以，中国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负债，而这些负债大部分压在了基本建设投资形成的物业资产上，短期无法收回。也因此一定导致承担投资的银行流动性资金短缺，从而迫使“央妈”放水。从中国自身来说，大量投资造成国有部门债务，不放水就会投资枯竭，中国经济就会下滑。因此，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其实很大程度是财政债务和央行金融这两个都在放水的“龙头”。

无独有偶，世界上在金融资本阶段的所有国家都在增发债务，区别仅在于能不能控制通胀率和利率来维持增发。从现在情况来看，那个强势国家的政府是不还债的，主要是向世界各国发新债来抵不可能偿还的旧债。因此，在21世纪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新现象，就是债务大规模增加，但是没有哪一个发债的打算还清债务。这就是世界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部世界势必再度因债务和金融双扩张而导致的内生性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并最终演化成全球危机爆发。也就是说，类似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全球危机的情况会再度爆发。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中国被动地陷入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